

旧红新裁 熠熠生辉

——简评《东方文论选》

郁 龙 余

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主编的《东方文论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在中国文艺理论界，是一件很具有意义的大事。中国文论从先秦诸子的“兴观群怨”、“大美无形”等到清代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理论，自成体系，源远流长。自王国维《人间词话》引进西方文艺理论，中国文坛大河改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样，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两点一线”发展到“三点成面”

晚清以降，西方文化滚滚东来，这是发展的必然，无可厚非。但是，中国文论家们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力图有所突破。于是大力引进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美学，对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展开深入的比较研究，成绩斐然。我曾经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一文中指出：世界比较文学的中心实际上已经来到中国。^①但是，大家可以看出，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心地位主要靠“数量”支持的，它的巩固有待于“质量”的提高。而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是视野不够开阔。清末以前，只知中国文论；现在只知中国和西方，对东方各国的文论所知甚少。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中国和西方，两点一线，象一根高空钢索一样，中国文论家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进行比较研究，在中西文论的钢索上做各种动作。时间一久，一些人出现浮躁情绪，有人形象地称中国当代文论为“悬浮的河”。

中国文论有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只有中国的一个点，自成一体。到清末以来又加上西方的一个点，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两点只能成一线，只有三点才能成面。有了“面”，就有了舞台，文论家们才能演出各种声色俱佳的戏剧来。东方文论就是这第三个点。《东方文论选》的问世，标志着这第三个点的开始形成，标志着中国文论从“两点一线”的第二阶段发展到“三点成面”的第三阶段。象三维世界不同于二维世界一样，“三点成面”与“两点一线”也截然不同。因为这个“三”不仅比“二”多了一个参照和比较，而且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即多，有了东方文论，世界文论就全了，我们真正有资格谈世界文论了。

二、为研究东方文论提供了起跳板

中国文论家们悬在中西两极之间，紧追西方层出不穷的新流派、新理论不成，回到中国传统文论母床也不行。建构富于中国特色的新文论，成了中国文论家们的共同愿望。但是怎样建构新文论？许多人又回到“中西兼融”的思路，还是两点一线。困惑中，有人提出了“东方视野”，更有人渴望在东方文化、东方文论的研究中获取新的营养。《东方文论选》就是在这样一种

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季羨林先生说：“我曾有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上提出了一个口号：‘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个口号。”^②这个带有先知预示性的口号许多人不理解，但我完全赞成。中国新文论光靠西方不行，还必须靠东方，靠东方文论的加盟。不少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这一点。黄宝生先生在《印度古典诗学》的序言中说：“我们迫切需要加强东方文学和诗学的研究，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派的崛起和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在若干年内，国内的东方文学学者能潜心研究印度、阿拉伯、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理论，推出一大批东方文学理论的翻译和研究著作，那么，‘水涨船高，泥多佛大’，中国的比较诗学必定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③

东方文论宏富、深邃，是世界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东方各国、东方各国与西方、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只有在了解东方各国之后才能搞清楚，否则只能是盲区。例如，苏非主义与苏非文学，为什么会在近代回光返照？在西方大有市场？要搞清楚这点，就必须研究其历史，一研究才知道这个以波斯为主要地域的苏非主义与苏非文学，在伊斯兰世界曾有过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它的形成，除了伊斯兰教内部因素、本土民族文化因素之外，还深深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和以禅宗为代表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再如研究戏剧，仅仅知道欧洲和中国是远远不够的，就会得出戏剧起源于希腊、发达于中国的结论。对东方文学和文论稍有常识的都知道，人类戏剧最早起源于埃及，并对古希腊戏剧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古希腊戏剧殒落之后，世界戏剧的太阳照在印度上空，印度戏剧曾经有过非常辉煌的历史，印度的第一部文艺学著作《舞论》就是一部研究、总结印度古代戏剧的专著，故又译《戏剧学》。印度戏剧还通过佛教等渠道对中国歌舞产生过巨大影响。

总之，不了解东方文学和东方文论，就无法全面把握世界文学和文论。在当今这天涯咫尺的地球村时代，对掌握了中、西文论的中国学人来说，了解东方文学和东方文论，是构建中国文论新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如果说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论是一尊宝鼎，那么中国文论、西方文论和东方文论就是这宝鼎的三足。《东方文论选》的功绩就是为中国学者研究东方文论提供了一块起跳板。

三、有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五·四前后，许多中国学人患有食古不化症，盲目拒绝西方文化和文论。现在，不少人程度不同地患有食洋不化症，受到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严重影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产生，原因十分复杂。但对我们中国学人来说，对中国文化的轻视和对东方文化的无知，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偏见与无知是孪生兄弟。正如季羨林先生在《东方文论选》的序中所讲：“我们眼前有一个很大的困难：知西而不知东。知西知道什么程度，虽然还可能有些疑问；但是不知东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这种‘无知’则是‘贾桂思想’的根源。”与西方相比，我们中国学人是应该感到惭愧的。西方人在历史上曾先后五次向东方学习。而每次学习都有收获，自信心愈强，都使西方的文化有了新的飞跃。英国青年排字工乔治·史密斯从亚述古城尼尼微图书馆的泥版文书中，破译出一个大洪水的故事，竟与《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同出一源。于是，沉睡了4000多年的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就被发现了。人类最早的史诗不是《奥德修》和《伊里亚特》，而是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当史密斯将他的考古发现在“圣经考古学会”上宣布时，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和轰动，同时也显示了他的胸怀与魅力。难道我们不应该从史密斯等人身上吸取点什么吗？

西方许多学者对东方文学怀有美好的情意。如席勒对印度名剧《沙恭达罗》推崇备至。歌德在读了波斯诗人哈菲兹的抒情诗后，大受启发而着手创作《东西诗集》。在这本诗集首卷他写道：

谁要真正理解诗歌，
应当去诗国里徜徉。
谁要真正理解诗人，
应当前去诗人之邦。

西方人了解了东方文学，就表示出如此由衷的敬佩。那么，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东方文论，也一定会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而心悦诚服。

东方文论，闪烁着奇光异彩。但是，要编译出一个东方文论的好选本，并非易事。曹顺庆先生主编的《东方文论选》，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选本。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条。第一，请人得当。主编曹顺庆先生所请的译者和编委都是各国别文学和文论的真正一流专家。我熟悉的就有季羡林、金克木两位老先生和黄宝生、张鸿年先生，其他几位虽然我不熟悉，但从他们的概述与译文中可以知道，也都是学力非凡之人。第二，译选精当。东方文论数量巨大，语种复杂，如何译选，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反映全貌，难度很大。但编译者们把握全局，取精用宏，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译选精当的东方文论选。第三，规模适当。作为第一部东方文论选，近70万字的规模，应该说是适当的。要把握住这个规模，除了突出重点之外，存目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正因为以上三个问题处理得得当、精当、适当，所以《东方文论选》深受研究者欢迎，对广大文论家来说大有雪中送炭之感。学者买书，大凡都是为了研究的需要。但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一次或几次即可藏之书柜，一种是摆在案头，要用一生一世的。这本《东方文论选》就是属于后者。

此书所选的内容，都是东方古代文论，可以讲是“旧红”，但绝大部分都是新译，都是第一次与读者见面。所以我们说，《东方文论选》是编者、译者同心合力、匠心独运，用“旧红”裁剪成的一件熠熠生辉的“新衣”。我们感谢编者和译者的辛勤劳动。正是由于他们的辛苦，使我们大开眼界，对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诸国的文论有了新的了解。不仅给了我们同中国与西方迥异的新材料、新学派、新论点，而且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新思维。我完全相信，诚如季羡林先生在此书的序中所说：“读此一书，东西兼通。有识有志之士定能‘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融合东西，以东为主，创建出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把中国文艺理论的水平，东方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和世界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和水平上。”

① 见《中外文化与文论》第四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77年12月，第221页。

② 季羡林：《今日东方》创刊号“卷首语”，香港亚太新闻出版社，1997年第一期。

③ 黄宝生：《印度古典诗学·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2页。

（郁龙余：1946年生，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邮编：518060）